

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历程、经验及支撑性制度建设^{*}

杨新铭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预言,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一个伟大创举。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探索到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可以发现,要解码中国由计划经济成功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原因,就必须深入分析转型过程和党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要策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帕累托改进式过程,符合逐渐发挥市场作用的经济自然演进规律,弥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天然不足。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互补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就成为未来制度建设的重点。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又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可以在最大限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条件下使发展成果更多由人民共享,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制度优势。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领导经济 渐进式改革 支撑性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①。从早期探索,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巩固、完善并最终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历了几十年的过程。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了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缺陷,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而又保持宏观协调,具有既能发挥市场经济的灵活性、竞争性和激励作用,又能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双重作用和意义(宗寒,2014)。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张卓元,2012)。回顾这一过程,至少有三条基本经验尤其值得总结:第一,始终坚持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第二,始终坚持发挥政府的合理作用;第三,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进程。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正是这一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实践最终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需要建立一系列支撑性制度: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另一方面建立互补性制度,不断克服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缺陷和负面影响;此外,还要完善保障性制度,维持市场经济顺畅运行的环境。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体现,也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涵所在。

一、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

如果单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性似乎并

^{*} 杨新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yangxm@cass.org.cn。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7JISA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统结构、测度指标与重大问题研究”(20ZDA043)。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

不明显。但如果从整体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路径看,中国走出了一条使经济快速增长的既不同于转型经济体,又不同于其他东亚经济体,更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大国赶超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是渐进地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并改进政府经济治理的方式,以谋求市场与政府的最佳结合点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强调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一)从放权让利到确立商品经济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是从改变高度集中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开始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的同时,一方面着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另一方面重新肯定价值规律的重要性,提出“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①。其后,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都是沿着放权——提高基层组织和个人积极性的路径发展的。其中,农村逐渐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两权分离式新型经济模式;而城市则从利润留成转向多重代理的经济责任制。农村和城市放权让利的改革的一个结果是,在公有制绝对占优的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出现并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开始出现松动。

为了更好管理国民经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即“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②。其中,由市场调节的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③。尽管处于从属、补充地位,但事实上已经界定了一个允许市场调节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这一体制进行了重新界定,即“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④,并将商品经济作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从“计划为主”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跨越是巨大的。首先,在商品经济的定位上,实际上转换了计划和市场的主辅关系;其次,计划被划分为“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类,指令性计划仅限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而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则实行指导性计划;再次,限定了计划的实施依据,指导性计划依靠经济杠杆实现,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由此可见,尽管计划依然存在,但传统的行政指令性计划实际已经不复存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行了确认,并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与确立

虽然到党的十三大召开,市场调节已经是国民经济主要调节手段,但对于改革究竟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之所以有争论,是因为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等问题还存在模糊认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⑤“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为党的十四大召开起到了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②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9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页。

^⑤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⑥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载《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思想动员和统一认识的作用。党的十四大前,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提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①最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中央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说明中指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里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已经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范围大大扩大了,而且明确了价格机制在市场配置资源中的核心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并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五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践进行了高度评价——“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这一评价意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最终得以确立。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加速期,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逐步得以建立。

(三)市场经济体制从巩固完善到制度化、长期化

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细化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主要任务。其中,要素市场发展主要锁定在资本市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则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合。为了匹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作用也被限定在中长期和指导性措施上,因此,每五年制定的“计划”在“十一五”时期的名称改为“规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转变,标志着党对资源配置主体和机制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因为,计划特别是行政性计划,是通过政府系统实现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则是通过市场主体的选择行为特别是以价格作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寻求最有效率市场主体的过程。市场本身就蕴含着多元化主体的内容,因此,把计划改为政府体现了对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与市场作用职能定位,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这就明确了市场的主导性、决定性作用,而政府也并不只是起到简单的弥补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从“基础型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是我们党在经济理论上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丁任重,2021)。这一表述既尊重了市场又兼顾了政府,只有将二者说全了才能真正发挥市场政府双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发展声音,这就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并通过制度化来巩固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果。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共同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化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且长期有效的制度。

二、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既有别于其他转型经济体,也不同于发达经济体,为发

^①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展中经济体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市场化改革可以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从转型以及后发经济体的实际看,让市场化产生这些良性效果并不容易。因此,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市场化本身,而应该更多地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去挖掘。由前述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可以看出,渐进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政府作用持续有效发挥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别于其他转型经济体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三条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渐进式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当然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和经济成功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全部,也不是中国经济独有的经验。因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是一个基本共识,中国只是再次验证了这一命题。但成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却不是同期转型经济体都做到的事情。正如罗德里克(2007)所说的,中国的成功通常被归功于实施了市场化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没有充分的逻辑支持的情况下,把中国成功的案例当成标准改革处方^①正确性的明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从早期探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化,中国坚持了四十多年,先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到确立商品经济,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从匹配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机制设计到全面深化改革,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从配置资源的手段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构件之一的转变。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依然在不断深化过程中。显然,这是一个渐进过程。这种渐进过程不同于以“休克疗法”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也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一整套标准改革方案进行。既然市场是最有效率资源配置的形式,为什么不能采用“休克疗法”一次性放开所有市场,使市场发挥作用呢?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能否稳定下来,需要符合诱制性制度变迁规律。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看,诱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这是由市场体系多重性、复杂性,市场主体多元性和适应性等决定的。让两套制度体系实现平稳转化,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协调运转,市场主体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等,都需要一个过程,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市场体系构成,多元市场体系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市场体系既包括商品市场又包括要素市场,它们都依赖价格这一综合信息传递方式进行调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只是统计(核算成本)工具,不具有信息(反映供求关系)功能,而价格的这种综合反映供求关系的信息职能是逐步形成的,因此,从边缘处放开市场,从边缘商品到核心商品,从商品市场逐渐转向要素市场的渐进放开,符合价格逐渐形成的过程,使得整个价格体系变化趋于平稳,减少了价格大幅波动。图1展示了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在采用“休克疗法”一下子放开价格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从1992年算起直到2006年才将消费者价格指数恢复到两位数以下。而且,在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俄罗斯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高达1190(1993年)和2221(1994年),而乌克兰更是接近了4735(1993年)的高位。相比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大幅度价格波动,中国则平稳许多。因为,中国采取的价格双轨制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进,符合帕累托改进的要求(Lau et al, 2000)。即便如此,在推进价格闯关的过程中,中国也产生了较大幅度价格波动和居民抢购行为。1994年,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了24.26(见图1),这意味着价格信号的形成需要一个渐进式过程。据统计,目前价格机制已经在全国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发挥着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依然有3%的领域的价格形成由政府管控^②,而这部分价格的放开更加需要综合评价、审慎推进。

其次,市场主体的形成及其决策依据的调整也是不断演进的。价格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市场主体的形成同样需要过程。因为,市场主体决策是具有黏性的,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一般来讲,市场主体至少应该包括三类: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家庭和政府。企业是最主要的市场经济组织,绝

^①即“华盛顿共识”提供的改革方案。

^②参见《发改委举行输配电价改革及价格市场化程度测算情况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fzggw/Document/1559565/1559565.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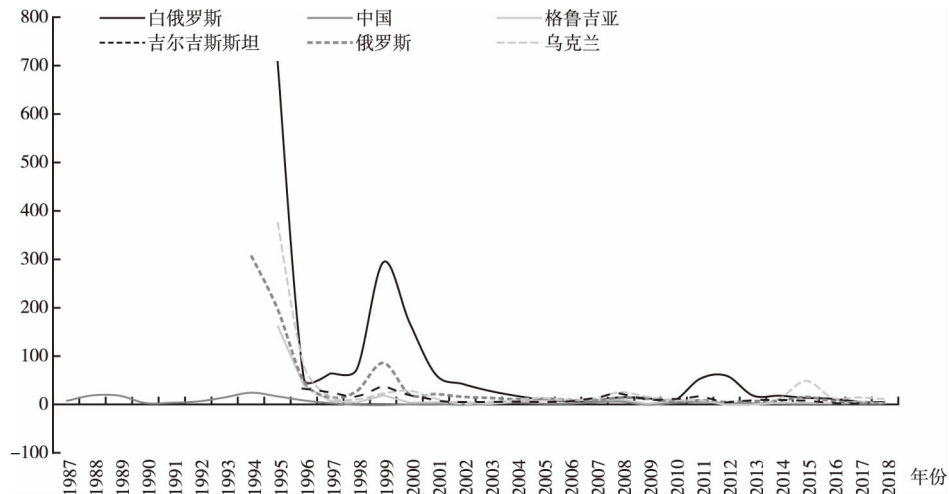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其他转型经济体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都由企业完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国有或者集体形式存在。这些企业习惯依据行政指令安排生产,并不能马上适应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在价格还不能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的条件下,试图通过大规模私有化使公有制企业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既可能失去了原有形成供给的基础,又可能在错误的信号指引下造成更大的误配,从而造成效率的双重损失,其结果则是大规模的衰退。苏东经济体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时,不但没有促成经济成长反而造成了大规模经济衰退和经济波动(见下文)。反观中国,与市场适应的主体是与边缘市场放开同时进行的。市场和市场主体同步培育过程中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而是通过放开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个体经济来进行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倒逼了国有企业改革。随着市场的壮大和作用的扩大,原有公有制企业也需要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由此开启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的:其一是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这方面主要是在探索经营机制、治理机制、监管机制改革中不断深化进行的。其二是探索多元化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这方面主要是在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主导作用条件下,从宏观混合经济到微观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设计建构中深化进行的。显然,中国公有制经济改革并不是单纯的私有化过程,而是更加复杂的适应市场的过程。这种增量的试错过程对整个社会来说符合帕累托式改进逻辑。家庭是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的主要来源,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要素资源。家庭决策分散性天然地具有适应市场导向的特征。至于政府,涉及多重身份转换,下文单独论述,这里先不论述。实际上,除了企业、家庭和政府外,还有一类市场主体,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发育基础以后才能发生、发展并不断发挥作用。这类市场主体就是各种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这些组织可以依据不同的行业、地域等进行划分,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补充政府治理盲区,承担一定的市场治理功能。然而,社会组织的发生、发展是以市场主体不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市场主体行为不断规范为基础的,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二) 始终坚持发挥政府作用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政府并没有选择简单退出,相反,选择了一种渐进式转型的路径。这种转型主要不在于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和范围,更重要的是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为了适应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政府逐渐从计划制定者转变为经济调控者,从依赖行政命令下达各种经济指标转变为依靠经济政策引导市场预期,从广泛动员分配各种要素资源和物资转变为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这些转变意味着,政府不是退出了,而是努力适应市场扩张转变发挥作用的形式,更好弥补市场不足,引导市场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形成的第二条主要经验,也是有别于其他转型经济体和发达经济

体,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借鉴的一条基本经验。

首先,政府参与经济生活范围和程度在不断扩大。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到新兴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①,西方经济主流思想都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发挥“守夜人”职能即可。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政府的作用都在增强。政府支出是政府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经济指标。由图2可知,虽然欧盟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差异较大,但其变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高收入经济体和经合组织成员该指标的变动过程与美国、欧盟的变化过程也是一致的。这就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主要经济体,虽然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但政府作用持续变大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所谓的政府作为“守夜人”理论的事实依据并不存在。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肩负着更多的动员经济资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其作用自然比发达经济体更多更大。而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讲,政府实际上还肩负着构建匹配市场配置资源制度规则的责任。因此,某种程度上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理应比发达经济体参与市场的程度更深远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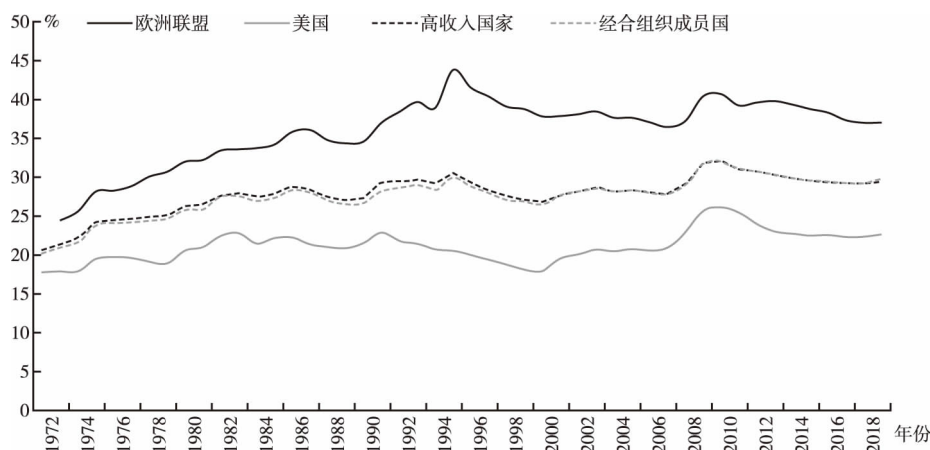


图2 发达经济体政府支出占比(1972—2019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其次,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方式比其参与范围和程度更重要。从实践看,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包括两大类: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是直接影响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行为,包括通过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向市场供给商品,提供经济性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应该明确,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领域、效率和条件是有差异的。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条件是有明确的建设任务。例如,在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西欧各国政府及其经济组织——国有企业,都直接参与战后重建,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有企业依然承担着保障市场供给的职能。据统计,2020年我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632867.7亿元,其中,中央企业353285.6亿元,地方国有企业279582.1亿元。^②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依然直接向市场供给大量商品和服务。从领域看,传统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而进入非竞争性领域,如公共产品供给和自然垄断行业。实际上,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都广泛存在国有企业。据统计,1980—2007年,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创造的GDP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维持在4%~10%。其中,奥地利为5.37%,法国为7.53%,芬兰为6.58%,意大利为

^①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是一个例外,但“无论是传统凯恩斯还是新凯恩斯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前提下构建的理论体系,它们都认为政府干预理论建立在市场失灵基础上,从而将政府同市场对立起来了。因此,无论怎样论述和强调政府的作用,实际上都没有跳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裴长洪、倪江飞,2021)。

^②参见《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国资委网站,<http://www.sasac.gov.cn/n16582853/n16582888/c17476557/content.html>。

4.06%，挪威10.36%，爱尔兰为4.78%，瑞典为4.62%，英国和德国相对较低，分别为2.14%和2.27%（Obinger, 2014）。就我国来讲，在广泛的领域也都存在着国有企业。这意味着传统的按照竞争性来划分国有企业存在领域并不恰当，应该按照经营效率来考察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这是因为，决定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是多元的，简单按照市场结构来认定国有企业效率是不准确的。同样的竞争性行业，不同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也存在差异，而即便是非竞争性行业由国有企业供给也不一定是最高效率的方式。因此，需要具体依照效率差距和总体社会福利来评判国有企业是否存在（杨春学、杨新铭，2020）。应该关注的是，国有企业提供某些商品和服务本身内含着社会属性，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平性分配。这部分供给维护了总体性效率，而不能单纯依据经济利润来局部考量，如电、气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供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广泛存在的政府参与是间接参与，既包括制定宏观审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管控相关经济指标等，也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制度和相关规则等。从结果看，经济政策旨在影响市场供求关系或实际价格来调整经济运行，而制度建设则旨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来调整供求关系或价格信号。由此可见，虽然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本质上依然是市场发挥作用，只不过改变了市场发挥作用条件。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间接参与经济活动是政府使用更多更广泛的手段。在宏观调控中，政府在间接引导预期方面有两个明显工具，短期是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当年宏观经济政策，中长期是通过实施“五年规划（计划）”合理安排引导资源配置。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经济内容一般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上年经济运行情况总结；第二，本年度宏观经济政策力度、节奏安排。“五年规划”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工具，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计划，主要是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布局、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和社会事业等做出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作为中国政策的核心机制，“五年规划”在为市场留出充分空间的同时，发挥着战略政策协调、资源动员、宏观调控方面的重要功能，这成为中国与其他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一个本质区别（韩博天、麦尔敦，2014）。另外，市场监督、法律仲裁、强制执行等制度建设，既是政府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手段，也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政府只有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使市场主体能够按照市场指引发挥自身的活力，才能真正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再次，参与经济生活需要政府不断提高自身经济治理能力。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需要政府合理发挥作用，提升治理效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这就需要合理划定政府作用边界，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将市场能够决定的坚决交给市场，减少政府不当干预；把市场不能做的坚决做到位，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化的逐渐完成，政府决策科学化程度也应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就内含着宏观调控科学化。从实际看，中国政府经济治理科学性不断提高，表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是经济波动越来越小，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特征。而反观之前的经济增长过程，则呈现明显的扩张——紧缩交替出现的剧烈波动。究其原因，则是政府管控经济的方式和治理能力发生变化的结果。在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中国经济更多依赖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府投资。从图3可知，政府投资作为政府调控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当年投资扩张，第二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扩张，紧跟着投资紧缩则会带来经济增长率也下降。这种管控经济方式对于形成稳定预期，引导资源合理配置是不利的。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政府多元管控经济手段增加，特别是逐渐放弃投资引导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这种滞后相关的关系逐渐淡化。这意味着，政府治理经济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而不是放任经济不管。

（三）始终坚持党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

在原有经济理论框架下，计划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体制，相应的市场和政府作为两个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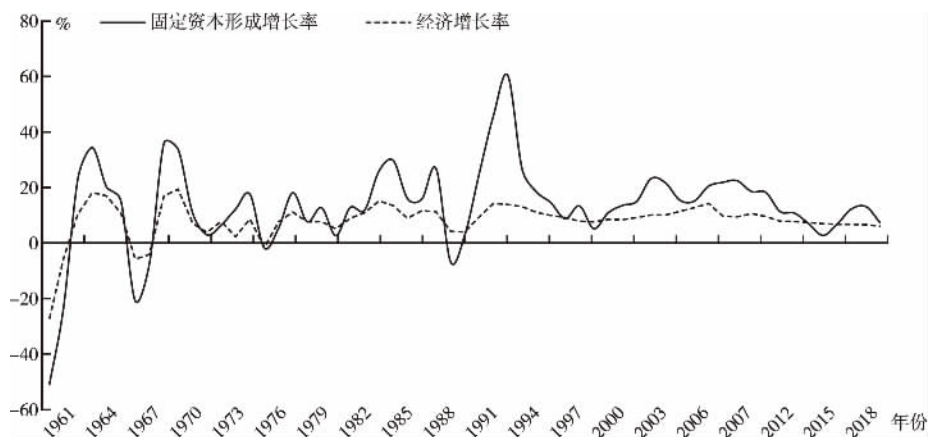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1961—2019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主体存在。这样，政府背后的政党以及相应的政治过程就被忽视了。西方两党或多党轮替的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在经济追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挥了独特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五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完善的整个过程遵循了“政策推动→实践验证→制度(法律)巩固→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何伟、杨新铭, 2021)。显然，在从政策推动到理论创新的各个环节，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发挥着领导和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也不例外，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推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一条经验。

首先，坚持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为两种经济体制平滑转换提供了制度保障。无论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设定，还是渐进式改革进程节奏的把握，抑或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发挥，都离不开执政党的稳定和一贯性。这是因为，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中突破原有体制惯性，使新体制发挥作用并产生效率改进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对比苏东转型经济体的体制转换过程的经济表现可以直观发现政党和政治波动对经济的严重冲击。如图4所示，以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为分界点，中国和其他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分化过程。在分界点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转型经济体基本一致，甚至波动还略大一些。但在分界点上，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分界点之后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进一步缩小，周期进一步延长。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其他转型经济体在分界点前较之中国波动幅度还略小一些，这意味着其计划经济的管控能力整体上优于中国，但在分界点上这些转型经济体都经历了大幅度衰退过程，而分界点之后这些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波动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更加剧烈，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一步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再次出现大幅度衰退)。究其原因，是这些经济体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内部都出现了政治波动，执政党轮替波及了经济政策持续性。由此可见，党的领导和推动为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体制的平滑转换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是政府政策得以一贯并不断科学化的前提。它有效规避了两种体制转换不顺畅可能产生的信息真空、资源配置混乱、效率损失(何伟、杨新铭, 2021)。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独有的政治体制确实发挥了优越性，也正是有了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使政策得以持续连贯地不断向深入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跨越一个个门槛，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次，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基于科学研判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点在于确定改革总体方向和阶段性目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

^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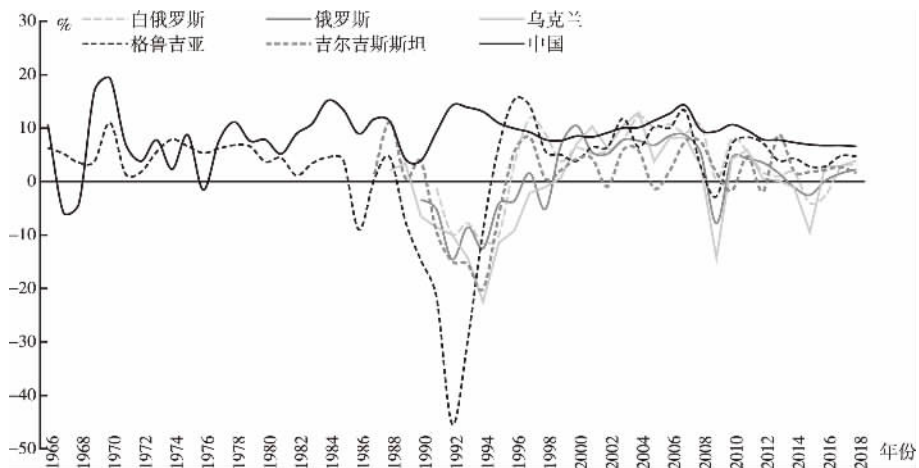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经济波动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界定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中国经济体制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全面开启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建设。经过十几年的建设,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阶段性研判,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匹配新时代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其制度化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为此,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将其界定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项伟大创造。这实际上是在新发展阶段,通过制度化巩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经济制度的地位。由此可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节点上,党都密切关注、科学研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阶段性,并不断提出下一步改革的任务和方向,这就保证了改革前后的一致性,保证了改革着力点和主攻方向的前后衔接和不断推进。

再次,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机制不断制度化、长期化,稳定了各方期待与预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中全会、三中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分别锚定短期、中期、长期经济问题和总结经验、提炼党的经济指导理论的体制机制体系。具体来看(见表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休会期间的第三次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项;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党代会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的纲领,并对前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从党的决议角度给予确认并提炼为党的经济理论;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党代会休会期间的第五次中央委员会全会集中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建议,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纲要确定方向和总体原则;从1994年开始,每年11月或12月召开年度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总结当年的经济工作成绩,分析研判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制定下一年度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显然,这种制度既稳定了市场预期,又谋划了未来经济发展,还对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进行了及时总结,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趋向成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表1 党领导经济工作机制的制度化过程

会议类型	开始制度化的时间和标志性会议	标志性文件	主要锚定事项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党的十二大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把握阶段性特征,锚定未来发展方向
三中全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经济体制改革
五中全会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擘画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和阶段性长远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99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总结当年经济工作,确定下年政策取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制作。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的制度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有时也会因特殊需要进行临时调整。比如,1978年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是在1985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是在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直到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后历届五中全会讨论“五年规划”才制度化成为党的一项定制。又如,虽然三中全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成为定制,但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是政府机构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则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更高层次上把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党执政的持续性是政府经济政策持续性的根本保障。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框架下,用政府代替政党的好处在于可以抽象不同政党主导下的政府的一般特征,但这种抽象在经济政策上却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偏离。实际上,政府与政党执政理念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当政党交替执政时,政府经济政策往往出现较大偏离甚至出现反转。这就是政治周期为什么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中国,虽然存在党政同构的典型特征,但在前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过程中,党、政形成了各有侧重、科学分工的状态。其中,党领导经济工作集中在科学研判发展阶段、发展大势,提出发展理念、发展方向,谋划发展格局、发展战略等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人民性等重大理论现实问题,而政府则以此为依据制定更加细化、可操作、能落地的经济政策。这就保证了即使领导人出现交叠,也不会影响经济工作的持续深入发展。同样,以“五年规划”为例,从“七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的8个“五年规划(计划)”,领导人有多次交接,政府换届周期和“五年规划”周期错位并没有影响规划的顺利推进,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应该指出,中长期经济规划本身并不是中国所独有,苏联、印度等很多国家都有。例如到2017年,印度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十二个五年计划,但其执行往往受到政党更迭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4—1979年第五个五年计划因1978年人民党取代国大党执政而被否决,而人民党制定的1980—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又在1980年国大党重新成为执政党以后被政府否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由此可见,经济政策或者中长期规划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根本经验来看,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逐渐制度化、科学化。

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基本事实与支撑性制度建设

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过程可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完全按照新古典最优理论推进,而是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渐进式探索道路。从经济学角度看,渐进性改革虽然不是经济理论上的最优,但却是现实经济体制转型的最优路径,其内在理论基础蕴含在两个基本事实之中。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是多样的。既有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还有日本的行政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学理论提炼的是这些模式的共性,抽象掉了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但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在真空中孤立运行的,而是依赖人的决策行为,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非经济制度的影响。这些非经济制度本身融合了政治、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多种制度,为本国的市场主体所接受和适应。这必然使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偏离纯经济理论架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生长和发育的,原有非经济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因此,某种程度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天然的具有社会主义(体现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和政府通过多种形式发挥作用的特征。此外,除了市场体系与市场主体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需要渐进过程外,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非经济制度调整也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如前所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边缘生长到逐渐替代而完成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在此过程中,原有匹配计划经济体制的非经济制度也有一个逐渐市场化的过程,这就包括一系列行政审批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制度与市场接轨、融合,并符合中国实际的过程中需要更长的时间,其结果往往与标准经济学分析框架也不同。

第二,市场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失灵”,二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市场失灵是依据市场配置资源存在无效率的领域。尽管学术界对某些市场失灵还存在争论,但在实践层面针对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品以及自然垄断等方面政府都作出了应对政策。前文在论证政府作用时各国对于市场负面结果有不同认知,解决方法也多有不同。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是中性的,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特征。但是,一个国家受历史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会有特定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与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可能产生冲突,因此,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负面”结果,不同国家也进行相应的干预以满足社会价值追求的要求。这方面的影响主要指收入分配恶化及其经济波动效应。由于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富人(资本所有者)收入增长快于穷人(劳动所有者)从而拉大收入差距(皮凯蒂,2014)。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平稳运行是巨大挑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会导致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凯恩斯,1936)。从经济发展史看,20世纪80年代前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波收入分配改善浪潮,其中,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改善来得更早,发展中经济体稍晚一些。但到了1945年以后,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收入差距都有了较大幅度改善。最高1%人口的收入占比迅速下降到10%左右,到1980年下降到4%左右,其后重新开始上升(见图5)。由此,罗楚亮(2018)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不存在自发的收入分配改善机制,也不存在内生的恶化机制,在更大程度上收入差距的变化应当归因于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某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应该说,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既存在由资源配置效率触发的“收入效应”——普遍改善人们的福利状况,也存在激励机制上的“马太效应”——拉大收入差距。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两种效应叠加出不同的结果,表现为经济周期性波动和收入改善、恶化的过程。显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既有自身发挥作用空白导致的“市场失灵”,又有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不同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都不可能由市场经济体制内生解决,而是需要一整套相匹配的支撑性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顺利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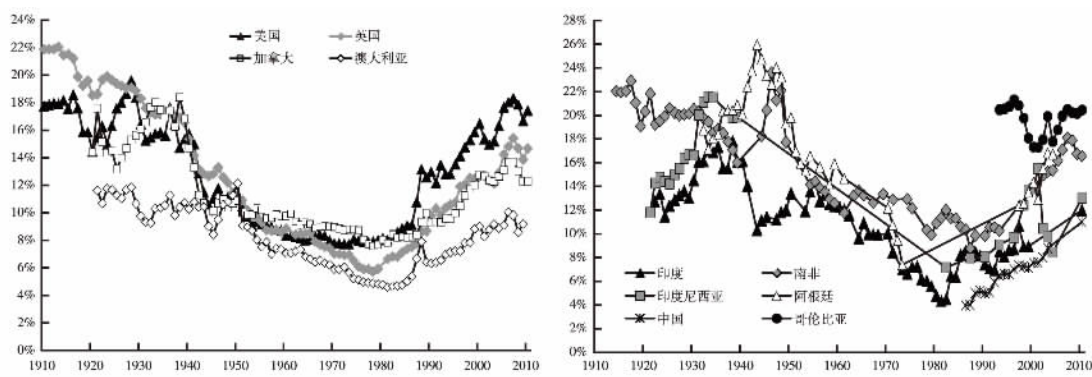


图5 1910—2010年最高收入人群收入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皮凯蒂(2014)。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支撑性制度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没有沿循标准经济学教科书给出的方案,而是依赖非常规、非标准的制度安排保护了产权、发挥了市场激励作用、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罗德里克,2007)。但从长远看,这些非常规、非标准的制度安排本身需要一个常规化、标准化的过程。如果不能实现从非常规、非标准制度向常规、标准制度安排的平稳转化,此前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可能会失效。这是因为,只有实现常规化和标准化才能满足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也才能降低非常规、非标准制度安排较高交易成本的问题,从而继续创造改革红利。从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划分,支撑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二是市场经济对冲性、互补性制度,三是市场经济保障性制度。把握好三个层次的支撑性制度建设是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内容。

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两个方面(黄群慧,2018)。市场配置资源是通过以价格为主要信号的交易过程,引导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市场主体。这里有三个机制在发挥作用,即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产权是市场经济有效激励的基础。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交易前提是具备完整的产权或者能够转化为经济结果的特定产权要素。只有在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的情况下,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才是有效率的,也即市场交易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关于产权,包括对产权的界定和有效保护。显然,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一种结果认定。就交易制度而言,其核心是参与各方拥有平等的地位,任何一方都不能借助其已有的市场势力进行不对等交易。当前,规范交易过程公平性需要注意三种歧视倾向:第一是所有制歧视,即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不对等;第二是规模歧视,即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不对等;第三是产业歧视,即处于不同产业的企业不对等(这里有很多划分,例如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虽然存在着各种内生因素使这些歧视广泛存在,但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必然要不断减少或规避这些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悖的歧视。就价格机制而言,其信号作用的发挥是基于价格可以充分反映商品要素资源的稀缺性。虽然,全国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由市场所决定,但剩下的3%的领域,如资本、土地、资源、能源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部分自然垄断环节等领域的价格依然由政府管控。这些领域——或者关系国计民生,影响居民福利改善;或者关系产业链上下游,影响整个价格体系稳定——不能单纯从效率角度出发,更要从外部性、社会公平以及全社会福利进行整体性评估(何伟、杨新铭,2021),通过顶层设计审慎推进相关领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其中,需要尽快破除体制性、制度性、区域性以及歧视性等因素导致的分割和阻碍,而需求价格弹性低、自然垄断特征明显以及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业,则需要根据分类和分环节更为细致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第二,强化市场经济互补性制度。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兼顾了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优势和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要求,完美体现了邓小平同

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①。这就需要一整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补充的制度。所谓市场经济的互补性制度是针对市场经济体制缺陷进行制度设计以实现经济整体效率改进的制度。据此,可以将互补性制度划分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负面后果两大类制度。具体来看,在弥补市场失灵上,政府始终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弥补公共品供给不足,解决垄断品价格和供给量矛盾等问题。在克服市场负面结果上,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特别是宏观经济稳定制度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数量型、价格型和结构型相结合政策体系,丰富了宏观调控的工具箱,财政、货币与宏观审慎政策有效契合与衔接,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保持经济总体稳定,避免大起大落。随着我国由赶超经济体向成熟经济体转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引导更高质量更高效的发展。同时,要提升经济内生能力,特别是要平衡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管理,平衡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以平抑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可能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国际税收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通过提高税率等来压缩收入差距的路径已经变得非常狭窄(郑新业等,2019),因此,克服市场经济扩大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就需要创新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约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②。显然,在制度安排上,中国已经开始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径,一方面通过脱贫攻坚消灭了绝对贫困,另一方面通过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减少相对贫困,进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突出市场经济保障性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其运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维护社会环境需要整体安全观,构建一整套危机防范化解机制、协调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这些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运行的保障,因此,可以称为保障性制度。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演进过程不同,虽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渐进式过程,但其发展依然是嵌入式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只是这一过程符合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逻辑,因此,由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冲突和社会动荡。当前,“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③这些矛盾和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④从国内看,需要凝聚新的改革共识,突破传统思维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以增量改革化解存量矛盾的策略空间不断被压缩;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改革未触及的传统固有利益和改革过程中新固化利益交织在一起,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从国际看,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正在引起世界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传统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杨新铭,2021)。这要求我们协调好与传统发达国家的关系,尽快形成新的利益分享机制,避免国际矛盾传导到国内。显然,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还是应对国际挑战的外部需要,都要求把协调机制和冲突管理制度摆在越来越突出的位置。这就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从制度设计看,一方面,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通过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制度的兜底功能,减少绝对受损群体的产生;另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政策、工作上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升级。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既要关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者,又要关注大多数人的社会福利持续改善。此外,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从经济角度看,法治经济至少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广泛性,适用于在我国的所有市场主体以及自然人;第二,非歧视性,法律面前人人

①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②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

③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④习近平:《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2015年10月29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33页。

平等；第三，公开透明，有成文法作为行为标准。这些特点可以有效降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减少效率损失。当然，法治经济依托两个层面的制度建设：一是立法层面，要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法律要能跟上经济生活的变化；二是法律运行层面，要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规范各种行为的环境。法治经济的核心在于政府要依法行政。立法是基础，司法是关键。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运行主体都是政府部门，因此，只有政府在法律赋予的权力框架下运行，才能发挥法治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内涵所在。

四、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探索、提出、确立再到完善和制度化的过程即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也没有按照现成的理论去设计，而是根据中国经济社会现实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众所周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经济体都遵从了“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但遗憾的是鲜有成功的案例。特别是那些市场化改革越迅速的经济体，往往对市场化成果的失望也就越大——尤其是在拉美地区（罗德里克，2007）。由此可见，市场化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市场化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在于“华盛顿共识”给出的政策建议过于激进，旧体制的快速退出和新体制缓慢建立与运行之间出现了大量的制度真空。这种制度真空的产生，不但瓦解了传统计划配置资源的路径，还阻碍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发挥，造成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混乱。在政府还没有赢得普遍信任的情况下，资源配置方式的混乱不但造成效率损失，还引起了经济的巨幅波动和市场信心的丧失，从而酿成了转型悲剧，经济大幅度衰退。与苏东转型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回望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可以发现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由计划转向市场，而是更广泛基础上的社会整体转型，是以资源配置方式转型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体系的重构。显然，这种重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新旧制度需要过渡衔接，新旧制度之间的磨合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且，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人们也不可能会立刻适应新制度，相反，在特定阶段还可能产生一定的抵触、观望。这些都决定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只能采取渐进模式。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探索、确立到完善乃至升级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个过程，虽然具有明显的嵌入式制度变迁特征，但却符合诱致式制度变迁演进逻辑，是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帕累托改进过程，符合上述渐进发展的规律。不仅如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还创造性地允许退出、允许失败、允许观望，符合包容性改革、多元化改革的试错过程，最终走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促成了中国经济奇迹。

归结起来，除了制度衔接需要渐进式改革过程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成功还与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密切相关。第一，市场经济虽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但其本身也存在缺陷，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政府持续发挥作用。而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在多个层次上发挥作用：一方面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渐进退出让位于市场；另一方面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又允许多种形式进入并保留了较大规模可以在极端环境下发挥对冲作用的国有经济。此外，政府宏观经济管控能力不断提高，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第二，市场经济模式是多元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只有摒弃单一市场经济模式才可能抵制住“华盛顿共识”的诱惑，也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伟大创举。能够始终坚持政府发挥正确作用，并按照自己的节奏渐进推进市场化改革，得益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加强调发挥党的顶层设计职能，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从基础性制度、互补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三个层面进行完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优越性。鉴于社会主义市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经济体制不断成熟,显性制度替代隐性制度可以更好地降低交易成本,要用透明化、法制化的制度取代过渡性、非正规制度安排,并进一步压缩政府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 丁任重,2021:《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任务》,《经济学动态》第1期。
- 韩博天 奥利佛·麦尔敦,2014:《规划:中国政策过程的核心机制》,《开放时代》第1期。
- 何伟 杨新铭,20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基本逻辑与经验》,《求是学刊》第2期。
- 黄群慧,2018:《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经济参考报》8月22日。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有企业角色》,中信出版社中译版。
-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译版。
- 罗楚亮,2018:《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特征及其政策启示》,《北京工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罗德里克,2007:《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中信出版社2016年中译版。
- 裴长洪 倪江飞,2021:《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动态》第4期。
- 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中译版。
- 杨春学 杨新铭,2020:《所有制适度结构:理论分析、推断与经验事实》,《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杨新铭,2021:《深刻理解两个大局的内在联系》,《经济参考报》4月20日。
- 张卓元,2012:《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新视野》第4期。
- 郑新业 张力 张阳阳,2019:《全球税收竞争与中国政策选择》,《经济学动态》第2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五年规划”的历史经验与“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研究》,《经济学动态》第4期。
- 宗寒,20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创造》,《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期。
- Lau, L. J. et al(2000),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1):120—143.
- Obinger, H. et al(2014), “Partisan politics and privatization in OECD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9):1294—1323.

The Course and Experience of Explor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Building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YANG Xinm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 remarkable inv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leading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economy, breaks the prophecy o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realiz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Reviewing the process from explor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establishing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e can find, to understand the miracle of China’s successful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it is inevitable to deeply analyze the decisive of role play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s. It is proved by facts that reforms on economic system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as the main strategy, is a gradual process of Pareto improvement, which accords with the rule of natural evolution of economy by letting the market playing more important roles and corrects market failure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eform is deepening,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supporting the basic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complementary and security system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re becoming the focus of institutional building in the future. This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e will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let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shared by the peopl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doubl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Key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the Economy; Gradual Reform;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责任编辑:何伟)

(校对:刘洪愧)